

论赫尔德的历史语言观

李 睿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 德意志启蒙语言学家、哲学家赫尔德是狂飙突进运动的灵魂和理论奠基者。赫尔德语言哲学著作《论语言的起源》是语言哲学史上关于语言起源问题最知名的一部著作,标志着德国古典语言哲学传统的肇端。在《论语言的起源》中,赫尔德提出了“悟性说”,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的“悟性”,是人的“天生禀赋”。本文尝试从德语语言发展史的角度梳理赫尔德语言哲学思想,通过挖掘赫尔德历史语言观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及语言民族主义理论,揭示赫尔德语言哲学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即:赫尔德将17、18世纪德意志文化爱国主义者的人文主义“民族”概念发展为以语言为导向的“文化民族”概念,从而借助“语言民族”这一概念,使“文化民族”概念与启蒙运动的“国家民族”概念形成对比。

关键词: 赫尔德 语言哲学 《论语言的起源》 语言民族主义

18世纪的德国,处于“小邦诸侯专制主义”^①统治之下,与英、法等欧洲国家相比,德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较为落后;当时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早已意识到这种落后源于国家的碎裂状态以及德意志民族认同感的缺失,诚如诗人歌德那句耳熟能详的喟叹:

德国我亦眷注。当我念及德意志人民,我常深感痛苦,他们作为个人那样值得尊重,作为整体却又如此可悲。^②

① 参见丁建宏,《德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页115。

② 引自1813年12月13日歌德与耶拿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卢登(H. Luden)的对话。参见Gilbert Krebs / Bernard Polini(Hrsg.) . *Volk ,Reich und Nation. Texte zur Einheit Deutschlands in Staat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806 - 1918* (转下页)

18世纪德意志思想界和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思想界一样,也发生了启蒙运动。德意志启蒙运动并非是对洛克、笛卡尔、伏尔泰和卢梭等英法启蒙哲人思想的简单“复制”与“粘贴”,而是诞生了诸如莱布尼茨、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康德以及赫尔德等德意志启蒙者。他们希望指引德意志人民,以理性之光照亮蒙昧内心,摆脱宗教教条羁绊,反抗封建愚民暴政。德意志启蒙者的“宣言”写在康德那段著名的“1784年的启蒙定义”中:

所谓启蒙 就是使人从错在自身的幼稚状态中走出来。所谓幼稚状态 是指若无人引导就不会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这并非因为缺乏理智 而是由于缺乏决心和勇气 那么这种幼稚状态就是错在自身的。Sapere aude! 鼓起勇气 去运用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的箴言。^①

从康德所谓“错在自身的幼稚状态”中走出,就意味着人类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解放。

一 人类中心主义:赫尔德的“悟性说”

18世纪中期以后,启蒙运动达到巅峰,人类本身成为认知对象。^②在启蒙语言哲学家赫尔德的语言观中,可以觉察到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zentrismus)。^③赫尔德认为,人是“能言之生物”,“万物

(接上页注)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Allemand, 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1994, S. 32。歌德用 miserabel 来形容作为整体的德意志人民。Misere(f.) 作为一个借自法文 misère 的外来词,在18世纪超越了德文同义词 Elend 而成为当时的流行词汇。参见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二卷),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06,页1。

① 引自康德1784年所作《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参见 Immanuel Kant: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In: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Band 12, Verlag Haude und Spener, 1784, S. 481。

② 参见乌尔夫·迪尔迈尔等,《德意志史》孟钟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页175;以及庞文薇,《论赫尔德语言哲学思想的人类学根基》,载《外语学刊》2015年第6期,页2。

③ Erich Straßner, *Deutsche Sprachkultur. Von der Barbarensprache zur Weltsprache*.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95, S. 151。

之标准”；赫尔德为其名著《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如此开篇：

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语言。^①

在这部虽不厚重却影响深远的小书中 赫尔德还留下了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

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 人之成其为人 就因为他有语言。^②

赫尔德认为 语言是人类的本质特征 只有通过语言和理性 人才区别于动物：

上帝还教会了人将所思变为声音 以声音描绘架构 并以口吐之莲花统治凡间的艺术。从语言开始 人发展出了理性和文化；因为只有通过语言 人才能把握自我 操控思考与抉择。^③

语言起源问题是 17、18 世纪学者们最喜探究的主题之一。对于德意志学人来说 这个问题通常涉及两大方面：关于人类语言本身的起源；关于德语的起源和历史。前者是神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的兴趣所在，而后者则是语法学家和德语护养者们的话题。

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 在 17、18 世纪的欧洲 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基于基督教《圣经》传统的“语言神授说”。^④ 对于启蒙学者来说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 因为它涉及人类对自我的认知问题。可以说 人类语

①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 5。原文：Schon als Tier hat der Mensch Sprache。参见 J. G. Herder: *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Stuttgart: Reclam，1966，S. 5。

②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前揭，页 26。

③ J. G. Herder: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Wiesbaden: Fourier，1985，S. 117。关于赫尔德的“以音构义”理论，可参林远泽，《从赫德到米德：迈向沟通共同体的德国古典语言哲学思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9，页 104-130。

④ 姚小平，《论语言的起源》，“译序”，前揭，页 i。

言起源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对人智的评估;如果主张语言神授,这不仅意味着人类自己无法创造语言,更意味着语言作为人智认知世界的工具这一基本观点也难以成立。^①

1769年,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为“人类语言起源”这个焦点问题设立专奖,欧洲各国数十位学者参赛,以各自语言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最终获奖的只有一篇,即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此文标志着德国古典语言哲学传统的肇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西方语言学史研究者专门考察了当年参赛的30篇语言起源论作,对比后发现:若以推论的严密性和行文的谨慎性来看,赫尔德的论文并不占先,甚至不无漏洞。那么,究竟是什么打动了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评委,使他们定要将这语言哲学发展史上注定是划时代的奖项颁发给赫尔德呢?难道是因为那通篇的感叹号——代表着青年赫尔德的激情澎湃——抑或是赫尔德那诗化的语言风格征服了评委吗?

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评委之所以把这个重要奖项颁发给这个当时只有25岁的青年学者,是因为这位来自东普鲁士的青年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坚定地主张语言人类本源说,“决然否认神造语言的任何可能”^②。在赫尔德这部小书的结尾处,赫然写着“语言神授说不仅毫无用处,而且为害极大。它使人类心灵的作用丧失殆尽。”^③

赫尔德的核心观点是:语言起源于人类的“悟性”(menschliche Besonnenheit)。^④悟性,是人的“天生禀赋”;^⑤悟性建立在感觉的基

① Andreas Gardt, *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Vom Mittelalter bis ins 20. Jahrhundert*,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9, S. 219.

② 姚小平,《论语言的起源》,“译序”,前揭,页x。

③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前揭,页128。

④ 台湾学者林远泽将赫尔德自创的概念 Besonnenheit 译为“觉识”,是指“人能意识到他在实践的自由中,拥有这种一无所有的世界开放性的反思能力”。林远泽认为,这个德文概念在中文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对应,而姚小平的译法(“悟性”)容易与 understanding 这个认知能力的中文翻译相混淆。通过参考海德格尔对 Besonnenheit 概念的阐释(Besonnenheit = Vermögen der Besinnung [知觉能力] = Bewußthaben von etwas [对某物的具有意识],参见 Heidegger, *Vom Wesen der Sprache*, S. 190)林远泽建议将其译为“觉识”,以符合这个德文所有的“明觉而识知之”的含义。参见林远泽,《从赫德到米德:迈向沟通共同体的德国古典语言哲学思路》,前揭,页123。

⑤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前揭,页29。

础之上,①“当人处在他所独有的悟性状态中,而这一悟性初次自由地发挥了作用,他就发明了语言”。②这种悟性是“人类种属固有的,语言和语言的发明也同样如此。所以,语言的发明对人来说是极其自然的,就像他是人一样自然!”③

赫尔德认为,人类语言起源于一次创造性的、感性的、肉体和精神相结合的“活动”。④这一观点后来为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所继承并发展,洪堡提出了著名的“创造活动说”(Energiea-These):

语言不是僵死的“成品”(Werk, 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Tätigkeit, Energiea)。对语言的真正定义只能是一种不断生成的存在,是一种精神的永动。⑤

从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洪堡所谓的“创造活动”是一种社会言语活动,它既指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语言行动(Sprachhandeln),也指集体语言行为。⑥语言也不仅是一个静态的、需要被人描述的概念和规则体系,而是动态的社会语言实践。而语言的使用者也不再是理想化的某种语言共同体,而是指处于一定的具体社会交际情境中的某些可区分的“语言人口群”(Sprachbevölkerungsgruppen),正如赫尔德所说:语言始终是“民族的语言”(Völkersprache)⑦。

二 彻底启蒙者的反理性主义:哈曼与赫尔德的语言怀疑论

凭借着“悟性说”和“创造活动说”,赫尔德和洪堡成为18、19世纪

① 对于赫尔德“悟性”(Besonnenheit)概念的理解,参见姚小平,《论语言的起源》,“译序”前揭,页vi。

②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前揭,页32。

③ 同上。

④ Peter von Polenz,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II*,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4, S. 330.

⑤ Wilhelm von Humboldt, *Schriften zur Sprachphilosophie*, Werke III,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3, S. 418.

⑥ 参见 Peter von Polenz,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I*,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4, S. 2f.。

⑦ 姚小平译为“社群的语言”。参见姚小平,《论语言的起源》“译序”前揭,页iv。

语言哲学家的代表。众所周知,赫尔德曾就读于东普鲁士柯尼斯堡大学,是启蒙哲学家康德的门生。若论对后世语言学、人类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等领域的影响,赫尔德本应被列为康德门下最优秀的弟子之一;然而,赫尔德在德国传统哲学界的地位并未得到应有的承认^①,概因赫尔德在晚年曾公开对康德的思想提出异议,是康德“最不得意”的门生。

早在1781年,康德出版《纯粹理性批判》之时,赫尔德就曾批评康德忽略了人类语言的问题。^②1799年,晚年的赫尔德又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之元批判》(*Eine Metakritik zu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此书一出,就被康德主义者视为“赫尔德式胡诌”,“根本不值一驳”。^③因为针对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赫尔德的这部书引起了德国哲学界的抵制,只有少数人敢于对赫尔德的批判公开表示赞同;连诗人席勒也跳将出来,成为赫尔德的坚决反对者,只因他是康德的信徒。^④

与赫尔德语言哲学思想一致的,除了后继者洪堡之外,还有赫尔德的知交好友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比康德小六岁、比赫尔德年长十多岁的哈曼,从1758年开始,就一直坚定地站在康德的对立面上;那时候的康德也还不过是个刚刚出版过一本较为重要的学术专著(《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并获得大学讲师资格的青年哲学家。

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1)出版之后,哈曼在1784年出版了《对纯粹理性纯粹性之元批判》(*Metakritik über den Purismus der reinen Vernunft*)。哈曼反对康德所谓“理性是认知最高原则”(Vernunft als oberstes Erkenntnisprinzip)的观点,强调人具有直觉和感觉创造力,人类的语言是精神与感性的统一,语言先于理性;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而是认知先验,堪比人类本能。哈曼被认为是“狂飙突进的先驱”^⑤,“现代语言分析哲学的先驱”以及“语言相对论的先驱”。

① 庞文薇,《论赫尔德语言哲学思想的人类学根基》前揭,页2。

② 伍铁平,《论人脑同电脑的“思维”、自然语言同电脑“语言”的区别》,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页46。

③ Elisabeth Leiss, *Sprachphilosophie*, 2., aktualisierte Auflage,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2012, S. 101.

④ Ibid, S. 102.

⑤ 范大灿,《德国文学史》(第二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页207。

先驱者哈曼语言哲学的最基本要素是语言怀疑论。^① 他反对纯净德语运动者所致力于的正字法改革、语法规规范化等语言净化努力。这场始于巴洛克时期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德语护养运动,在17世纪时被称为“语言工作”(Spracharbeit),到了18世纪末称作“语言净化”(Sprachreinigung)^②。从19世纪初开始,“语言净化”被称为“语言维护”(Sprachpflege)。

从17世纪巴洛克时期开始,受到文化爱国主义(Kulturpatriotismus)的影响,很多作家学者,特别是语法学家们,致力于“拯救”当时被视为“濒临灭绝”的德语。从语言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致力于将德语护养并发展为一种文学语言、学术语言和民族语言(Nationalsprache)。其具体措施诸如正字法、制定语法规规范、确立书面语规则、编纂德语词典、规范外来词等等。这场运动发展到极端,就演变成德语语言史书写中经常出现的这样一些具有论战性质的关键词:语言纯粹主义(Sprachpurismus),外来词斗争(Fremdwortkampf),外来词追捕(Fremdwortjagt)等。^③

哈曼之所以反对语言净化,是因为他认为这种努力代表了启蒙者对人类理性的狂妄高估。因此,哈曼主张对德语进行“非理性松绑”,也就是充分发挥德语语序相对自由的优越性,多使用倒装法,他称赞这种语序自由度代表着“德意志的自由和大胆”(deutsche Freiheit und Kühnheit)^④。哈曼还提倡句法高度压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省略如希腊人,譬喻如东方人”^⑤。哈曼的这些主张直接导致了他自己在行文上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讽刺、来路不明的典故、张扬个性的

① Leiss, Elisabeth “Die Vernunft ist ein Wetterhahn”. Johann Georg Hamanns Sprachtheorie und die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In: *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 19,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1, S. 259 – 273.

② 参见 Peter von Polenz,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II*,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4, S. 107.

③ Ibid, S. 107.

④ Ibid, S. 330.

⑤ 原文: Elliptisch wie ein Griech, und allegorisch wie ein Morgenländer。参见: Eric A. Blackall,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zur Literatursprache 1700 – 1775. Mit einem Bericht über neue Forschungsergebnisse 1955 – 1964 von Dieter Kimpel*, Stuttgart: Metzler, 1966, S. 337.

句读、大胆开放的句法、跳跃突变的语义、孤立无援的名词组合、复古主义的构词乃至稀奇古怪的屈折变化,形成了独特的哈曼文风。^①可以说,哈曼以实际行动令一代代德语护养者们自17世纪以来的努力付诸东流。然而,他的语言却对后世诸多名家构成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赫尔德、歌德、黑格尔乃至克尔凯郭尔都是“哈曼迷”,直到更为疯狂的表现主义的出现,才算终结了哈曼文风的影响力。^②

然而,哈曼看似古怪的文风之所以会对赫尔德和歌德这样的文学大师构成吸引力,并非毫无道理。这首先要回溯到哈曼和赫尔德生活的那个时代。18世纪中期以后,启蒙运动达到顶峰,“狂飙突进”来了。在德国文学史上,那是所谓的“天才时代”(Genie-Zeit);在德语发展史上,这一阶段的德语也被称作“天才语言”(Geniesprache)。所谓“天才”,就是天降的不拘一格,是“未被异化的主体”。^③哈曼对德语的“非理性放松”当然符合天才的做法,他被赫尔德和歌德等大师推崇备至的个性语言当然也可算作“天才语言”。

哈曼没有意识到,他这种“德意志的自由和大胆”与他所反对的德语护养运动并非毫无关系。正是德语护养运动使德语纯净化、规范化,从而提升了德语的可阅读性,使德语的交流范围不断扩大,德语使用者的语言能力增强,社会文化自信心也随之得到增强,个人权利的意识也由此得到发展,这才有了哈曼所代表的这种“文学语言个性化的历史性突破”。^④而伴随着以哈曼为代表的天才们的努力,也使得德语的规范化开始具有了对新发展新情况的适应性,从此,规范化所导致的德语复杂性的降低也被认为是一种“失真”,德语规范化也开始变得适当有

① Eric A. Blackall,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zur Literatursprache 1700 - 1775. Mit einem Bericht über neue Forschungsergebnisse 1955 - 1964 von Dieter Kimpel*, S. 332.

② Peter von Polenz,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II*, S. 330.

③ 原文: das nicht entfremdete Subjekt。参见 Peter von Polenz,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II*,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4, S. 302.

④ 见 Gotthard Lerchner, *Die historische Formierung von Spielräumen individuellen Sprachverhaltens. Vom Aufstieg des Individuums in d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114,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2, S. 227 - 248.

度了。^①

哈曼看似古怪的文风之所以会对赫尔德等文学大师构成吸引力,除了他们所处的天才时代之外,还有一点原因,那就是哈曼所坚信的语言本身具有的“天然无序性”(die naturhafte Unordnung),这种无序性体现在简洁、具象、感性的《圣经》语言中,对此,赫尔德也极为赞同。^②赫尔德认为,在路德的《圣经》译文中可以看到古老而阳刚的德语。哈曼坚信,“诗歌是人类的母语”。^③赫尔德也要求一种诗性的语言,那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不清醒的语言,他在语言中寻求真正的激情和充满力量的表达。赫尔德将非诗性的语言称为“理性的语言”(Die Sprache der Vernunft),并视之为“诅咒”。他批评启蒙哲学语言中那些“麻木的”抽象概念,并将这种语言风格形容为“双陆棋一般”。^④赫尔德认为,诗性的语言是众神的语言,也必须是人民的语言。^⑤

作为哈曼的挚友,赫尔德继承并发展了哈曼的语言哲学思想,哈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赫尔德作于1766年的《关于当代德意志文学的断片》(*Fragmente ü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teratur*)以及1782年的论文《莪相与古代民族的诗歌》(*Ossian und die Lieder alter Völker*)中。赫尔德认为,自16世纪之后,那种古老而阳刚的“硬核德语”(männliche und starke, alte deutsche Kernsprache)就失传了,我们只能在民歌、中古高地德语诗歌、路德的《圣经》译文及其创作的大众赞美诗中找到。赫尔德之所以背离高度发展的启蒙语言,和哈曼一样,也是因为那种完全的语

① Peter von Polenz,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II*, S. 329.

② Eric A. Blackall,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zur Literatursprache 1700 - 1775. Mit einem Bericht über neue Forschungsergebnisse 1955 - 1964 von Dieter Kimpel*, Stuttgart: Metzler, 1966, S. 324f.

③ 原文: Poesie ist die Muttersprache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 参见 Eric A. Blackall,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zur Literatursprache 1700 - 1775. Mit einem Bericht über neue Forschungsergebnisse 1955 - 1964 von Dieter Kimpel*, Stuttgart: Metzler, 1966, S. 332.

④ Erich Kleinschmidt: Entregelte Poetik. Zum dichtungstheoretischen Sprachaufbruch im 18. Jh. In: J. Dittmann / H. Kästner / J. Schwitalla (Hrsg.). *Erscheinungsformen der dt. Sprache. Festschrift Hugo Steger*. Berlin: Erich Schmidt Verlag, 1991, S. 78ff.

⑤ Erich Straßner, *Deutsche Sprachkultur. Von der Barbarensprache zur Weltsprache*, S. 151.

言怀疑论,他们与莱布尼兹和戈特舍德所代表的对哲学语言的进步信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立。^①

虽然没有哈曼走得那么远,但是赫尔德也积极努力地在自己的语言哲学著作和演讲中实践着反理性主义的创作风格,与文学史上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以及歌德和席勒的早期作品一样,形成了狂飙突进文学的语言特征。这些“天才时代”的青年作家们的创作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一种发自本能的、非传统的语言对高级文学语言的一种“文化革命式”的突破,这在文学史上被称作“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源于诗人剧作家克林格尔[Klinger]作于1776年的一出戏剧)。在语言哲学史上,这场天才文学运动也被称为“哈曼-赫尔德语言怀疑论的反理性主义”(Hamann-Herderscher sprachskzeptischer Antirationalismus)。^②这也就是哈曼被称作“狂飙突进的先驱”,而赫尔德被视为“狂飙突进的灵魂”的原因。尽管哈曼和赫尔德对启蒙哲学家康德的思想提出了异议,然而他们并不是“反启蒙者”,而是“彻底启蒙者”(radikaler Aufklärer)。^③

三 溯源德意志神秘主义

从哈曼和赫尔德对于路德德语(das Lutherdeutsch)的推崇不难看出,其实他们二人坚持的反理性主义的语言风格从德语语言史角度看是有传统的,这一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路德所崇拜的陶勒(Johannes Tauler)中古高地德语时期第三代德意志神秘主义大师。^④

在德语语言史上,13、14世纪属于神秘主义时代。中古高地德语在经历了经典时期(1170—1250)的发展之后,已然胜任表达细腻内心

① Erich Kleinschmidt: Entregelte Poetik. Zum dichtungstheoretischen Sprachaufbruch im 18. Jh. In: J. Dittmann / H. Kästner / J. Schwitalla (Hrsg.) . *Erscheinungsformen der dt. Sprache. Festschrift Hugo Steger*, S. 77 - 92.

② 参见 Peter von Polenz,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II*, S. 329。

③ Ibid., S. 329.

④ 关于陶乐,参见 I. Weithase, *Die Pflege der gesprochenen deutschen Sprache durch Berthold von Regensburg, Meister Eckehart und Johannes Tauler*, In: *Gestaltung-Umgestaltung, Festschrift zum 75. Geburtstag von Hermann August Korff*. Müller, J. (Hrsg.): Verlag: Leipzig: Koehler & Amelang, 1957, 46 - 75。

生活的语言内容。此时,中古神秘主义者尝试用德语表达他们的宗教感受和属灵体验,并借此实现与上帝的结合,这在从前只能依赖三大神圣语言(古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才能完成。为了能够用德语去领会上帝之不可思议(*unbegrifflichkeit Gottes*),用德语去描述上帝之不可言传(*das Unsagbare*),神秘主义者充分发挥想象力,为信仰和属灵生活创造了大量新鲜而合理的德语概念。^①

中古德意志神秘主义主要经历了三代大师发展,他们都擅长以细腻文字表现内心生活,语言上各有创新。第一代神秘主义大师是13世纪的马格德堡的梅西特希尔德(*Mechthild von Magdeburg*)。她是最早用德语散文描摹心灵感受的女作家,也是最著名的德意志神秘主义大师。马格德堡的梅西特希尔德继承了《圣经·雅歌》的文学传统,将人神合体想象为两性之爱,其代表作是用低地德语写就的《流动的神之光》(*Das fließende Licht der Gottheit*, 约1345)。生活在13到14世纪的霍赫海姆的艾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 von Hochheim*)是第二代神秘主义大师的代表,他创造了后世德语哲学中的一些常见概念(如 *All*, *Sein* 等)。第三代神秘主义大师以14世纪的苏瑟(*Heinrich Seuse*)和陶勒为代表。苏瑟被称为“神秘主义者中的骑士爱情诗人”,他把苦行僧比作骑士,骑士的女主人是圣母玛利亚,永恒的智慧是骑士的情人。^② 陶勒是斯特拉斯堡多明我会修士,他擅作布道词,语言简洁朴素,贴近大众德语,便于传教,因此直到19世纪,陶勒创作的布道词仍旧被教会使用,陶勒的语言风格为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继承,形成了天然、古朴、简洁而易于理解的路德德语。^③

① 德意志神秘主义者创造的词汇中包括许多以后缀 *-heit*, *-keit* 和 *-unge* 构成的抽象表达,如: *Gleichheit*, *Hoheit*, *Unwissenheit*, *Gemeinsamkeit*, *Erleuchtung*, *Vereinigung* 等;此外,神秘主义者还擅用前缀 *be-*, *ent-*, *er-*, *ver-*, *zer-*, *hin-*, *her-*, *in-* 等构成动词来表达内在心理活动,如: *begreifen*, *einsehen*, *einbilden*, *ausbilden* 等;除了派生法之外,神秘主义者还擅将动词不定式名词化,这些词汇后来都成为德国哲学常见概念: *daz niht*, *ϰaz wa*, *ϰaz al*, *ϰaz wesen*, *daz sin* 等。参见 Peter von Polenz,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10., völlig neu bearbeitete Auflage von Norbert Richard Wolf,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9, S. 52f.。

② 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一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页176。

③ Peter von Polenz,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10., völlig neu bearbeitete Auflage von Norbert Richard Wolf,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9, S. 54f.

为哈曼和赫尔德推崇的路德德语在近代早期对德语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中世纪德语文学书面语(即中古高地德语)对路德德语的影响并不大,路德德语的基础一是迈森官话(die meißnische Kanzleisprache)^①一是市民口语。如果要为路德德语定性,那么我们可以说:改革家路德所使用的德语既非文学书面语亦非学者书面语,而是民众语(Volkssprache),即百姓使用的白话。与神秘主义大师陶乐一样,路德也偏爱那种清新、直接、易于理解的日常德语。路德不仅是第一个将全本《圣经》译成德语的人,也是首位敢于使用底层大众所操鲜活日常语(Alltagssprache)来翻译《圣经》的人,只因他致力于让《圣经》成为广大民众都能读懂的一部基本书。不难看出,路德与哈曼和赫尔德的语言观一致。

虽然路德遭遇了帝国政府和天主教会的迫害,更受到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鄙视,然而他却通过路德德语从大众中收获了最强有力的回应和支持。路德认为,只有最简洁、最直接、甚至“最粗暴”的语言才能靠近民众。如今,从德语书面语的语体风格层面来看,“粗俗”固然是贬义,然而在路德那里,粗俗却是表达效果最好的。用路德自己的话来说,德语《圣经》必须采用“所有”基督徒的语言,要参照家中老母(die mutter jm hause)、胡同儿童(die kinder auff der gasen),以及贩夫走卒(den gemeinen man auff dem marckt)的语言去翻译神圣的经文。^②这就是路德《圣经》取得迅速成功的原因。路德那原始、天然、古朴、粗犷的语言风格意味着德语语言史上长久以来最积极、最有效的一次努力——即:让一种“没教养”的语言成为文学书面语,让一种自然而无拘束的语言具备文学表达能力——从而以顺应时代的、“所有”基督徒都能读懂的语言来将《圣经》呈现在普通读者面前。通过这种勇于亲民、“接地气”的翻译风格,路德《圣经》对整个德语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一次波及广泛的语言社会学运动取

① 迈森官话是萨克森公文语,主要在迈森、莱比锡和维滕堡等地选侯官署使用,也被称为新教标准语,它是东中部德语的代表;从15世纪开始,迈森官话(史籍中作 Misnica lingua, Meichsnische zung, meisnische sprache)就被称为普通德语(hochdüdesche sprake, Hochdeutsch)了。参见 Peter von Polenz,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I*,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4, S. 260。

② Erich Straßner, *Deutsche Sprachkultur. Von der Barbarensprache zur Weltsprache*.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95, S. 51.

得了重大突破。路德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德语真正与三大神圣语言并列起来。

中古德意志神秘主义和路德德语的继承者是17世纪下半叶的虔敬派(Pietismus)。虔敬派与早期启蒙主义一样,都是对晚期巴洛克浮华文风的反抗。除了高深的神学著作之外,虔敬主义者继承了德意志神秘主义的灵修文学传统,创作了大量赞美诗、自传及忏悔录等作品。在德语文学史上,与虔敬主义相关的关键词包括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us)、主观主义(Subjektivismus)以及感伤主义(Empfindsamkeit),感伤主义经由“天才时代”的狂飙突进运动发展而为浪漫主义。从德语史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语言主要是一种“市民语”(Bürgersprache)。^①德意志虔敬派的原则是“放低自己的人,应被提升。”^②他们坚信,只有通过使用市民语公开朗读自己的私人忏悔日记、分享灵修心得并合唱赞美诗才能真正实现探索自我属灵体验并获得声望的灵修目标。凭借着这种“大隐于市”^③的精神,虔敬主义被认为是德意志内在性(Deutsche Innerlichkeit)的起源。^④

四 赫尔德的语言民族主义

德意志内在性被认为是德意志民族的性格特征之一。赫尔德曾明确指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格与民族身份认同,它们体现在该民族的语言、诗歌、神话和传说等等载体之上,存储于该民族的文献类书之中。一个民族的语言和它的神话、传说、童话、民歌一样,是民族精神、民族灵魂以及民族性格的表达。^⑤

① Ludwig M. Eichinger, Von der Heldensprache zur Bürgersprache. Wandel der Sprechweisen über Sprache im 18. Jahrhundert. In: *Wirkendes Wort* 40, 1990, S. 74-94.

② Peter von Polenz,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II*, S. 314.

③ Gerhart v. Graevenitz, Innerlichkeit und Öffentlichkeit. Aspekte deutscher “bürgerlicher” Literatur im frühen 18. Jh. In: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49, Sonderheft, Stuttgart: J. B. Metzler Verlag, 1975, S. 1-82.

④ Peter von Polenz,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II*, S. 314.

⑤ Hugo Moser,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6. überarbeitete Auflage,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S. 26.

与哈曼的不同之处在于,赫尔德并不反对致力于德语净化的德语护养运动。赫尔德的语言维护目标是根据自然法则发展民族语言(Nationalsprache):赫尔德期待一种从民众共同体中发展出来的、具有坚实民众基础的德意志民族文化,而不是从外族借来的文化。因此净化德语中的外来语影响是可行的,否则,拉丁语和法语的文化影响会导致德语丧失民族性。赫尔德认为,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宝库,民族语言不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更能创造并且塑造民族思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赫尔德致力于搜集研究德意志民歌,他认为,民歌还未受外族文化影响。作为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之父”,^①赫尔德的这种民族语言观也深刻影响了狂飙突进时代的诗人,他的语言民族主义思想使狂飙突进的诗歌语言获得了表达力度与激情。^②

赫尔德曾称德意志为“未成之民族”(die ungewordene Nation),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语言哲学和民族语言观使德意志即便无法成为一个国家民族(Staatsnation),至少也能成为一个语言民族(Sprachnation),从而将德意志“从它对其他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之模仿的永恒创伤中解救出来”。^③这里提到的三个民族概念:国家民族、语言民族和文化民族分别对应着自19世纪初期以来主要的三种民族概念:政治的、语言的和文化的。^④“文化民族”这个概念,比较典型的使用者是浪漫派诗人思想家大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他所谓的操多种语言的“一个欧洲民族”(eine europäische Nation),以及操一种语言(比如德语)的“天主教民族”(die katholische Nation)或者“新教民族”(die

① 转引自丁建宏,《德国通史》,前揭,页125。

② Erich Straßner, *Deutsche Sprachkultur. Von der Barbarensprache zur Weltsprache*, S. 151.

③ 赫尔德在其著作《关于人类教育的另一种历史哲学》(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 1774; Werke Bd. 5)和《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4 - 1791; Werke Bd. 13 - 14)中,提出一种基于《圣经》文本的“民族”(Volk = Nation)概念。参见 Otfried Ehrismann, *Nibelungenlied. Epoche-Werk - Wirkung*,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S. 172。

④ Dietz Bering, *Juden und die deutsche Sprache. Fundierung eines Forschungsprojekts*. In: *Neue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Mentalitäts-, kultur- und sozialgeschichtliche Zusammenhänge*, Hrsg. von Dieter Cherubim, Karlheinz Jakob und Angelika Linke,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2, S. 277.

evangelische Nation) 指的都是“文化民族”。^①

从这里我们亦不难看出,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是密切而不可分割的:它们既相互依存也相互影响,这种关系也体现在格林(Jacob Grimm)对于“人民”(Volk)的定义上:“人民就是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的总称。”^②

雅各布·格林还有一句名言“除了语言和文学之外,我们[德意志人]还有什么共同之处?”^③在这一点上,赫尔德与格林的民族主义语言观是近似的。他们都将德语以及用德语写就的民族经典文学视为与德意志人民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民族经典文学是超越时间的民族语言标准范本。^④赫尔德认为,语言既然起源于人类的“悟性”,语言就是人的“天赋”^⑤是表达人的灵魂力量、人对世界的感知、人的情感的必要手段,因此一个民族的特定语言也可以决定这个民族的集体思维。赫尔德说:

谁以同样的语言受教育而长大,谁倾心于这种语言,谁学会在这种语言中表达自己的灵魂,谁就属于这种语言的人民。

如果语言是我们灵魂力量的器官,是我们内心深处教育的手段,那么没有比在我们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语言中受教育更好的了。^⑥

① Andreas Gardt(Hrsg.): *Nation und Sprache. Die Diskussion ihres Verhältnisses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0. S. 205.

② Jacob Grimm, “Über die wechselseitigen Beziehungen und die Verbindung der drei in der Versammlung vertretenen Wissenschaften”(1846), in: *Kleinere Schriften*, Band VII, T. 4, Berlin: Ferdinand Dümmler, 1884, S. 557.

③ Jacob Grimm und Wilhelm Grimm, *Deutsches Wörterbuch*, Bd. I, Leipzig, 1854, S. III.

④ Dietz Bering. Juden und die deutsche Sprache. Fundierung eines Forschungsprojekts. In: *Neue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Mentalitäts-, kultur- und sozialgeschichtliche Zusammenhänge*, S. 279.

⑤ 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前揭,页29。

⑥ Eric A. Blackall,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zur Literatursprache 1700 - 1775. Mit einem Bericht über neue Forschungsergebnisse 1955 - 1964 von Dieter Kimpel*, S. 340ff.

五 结 语

通过其语言民族主义理论,赫尔德将17、18世纪德国文化爱国主义者们的非政治性的、人文主义的“民族”概念发展为以语言为导向的“文化民族”的政治概念,从而借助“语言民族”这一概念,使“文化民族”概念又与启蒙运动的“国家民族”概念形成鲜明对比。^①这就为发展出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us)的“民族”概念铺平了道路,对德国民族意识的发展产生了强烈影响,也对19世纪和20世纪东欧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②赫尔德的语言民族主义(Sprachnationalismus)是其历史语言哲学系统中具有语言意识形态性质的组成部分。在狂飙突进运动和魏玛古典主义时代过去之后,赫尔德的语言民族主义在19和20世纪也产生了巨大影响。^③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被草率贴上“新浪漫主义”或者“德意志性”(Deuschtümelei)标签的文学趋势中,也在中、东欧和东南欧的政治历史中都留下了印迹:赫尔德论述的语言与国家、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当地政治历史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也符合赫尔德本人曾经大力提倡的“移情论”(Einfühlung):赫尔德主张,对研究对象——即:各个历史阶段和各种民族文化——的感同身受是教育与科研的基本原则。^④因此,赫尔德所引领的精神运动比人文主义运动更为全面,他不仅要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时期,同时也关注中世纪;他不仅将研究范围放在地中海周边民族,同时也放眼全世界——从旧大陆到新大陆。

最后必须强调,与萌芽于拿破仑时代的、带有明确政治性的民族主义理论相比,赫尔德的语言民族主义绝非狭隘民族主义,更非沙文主义,而是带有普世主义(Universalismus)性质,这从赫尔德出版于18世

① Friedrich Meinecke,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In: H. Herzfeld (Hrsg.), *Friedrich Meinecke Werke*, Bd VI, München: R. Oldenbourg-Verlag, 1969.

② Peter von Polenz,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III*.

③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将赫尔德的历史观称为“世界主义的文化导向的民族主义”,参见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彭刚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页35。

④ Hugo Moser,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6. überarbeitete Auflage, S. 25.

纪末的《促进人性的书简》(*Briefe zur Be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一书可见。^① 赫尔德的历史语言概念是非政治性的,而带有明确的语言神秘论(*Sprachmystik*)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讲,赫尔德的语言哲学甚至是生物学主义的(*Biologismus*),因为赫尔德的历史语言哲学有一个核心观点——“语言是一种有机体”:

“[语言]发芽,含苞,绽放并凋谢。”^②

① Peter von Polenz, *Deutsche Sprachgeschichte II*, S. 332.

② Ibid., S. 330.

Abstracts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Sprachnationalismus On Herder'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Its Influence

Li Rui

(Department of German ,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German enlightenment linguist and philosopher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is the soul and theoretical founder of Sturm und Drang. Herder's most famous philosophical work on language, *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is the best-known work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in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philosophy, and it also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philosophy. Herder believes that language originates from the *Besonnenheit* of human be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German languag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philosophy of Herder's language; and by digging deep into the theory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Sprachnationalismus* in Herder's language theory, it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Herder's language philosophy on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nationalism. Herder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humanistic *Nation* of the German cultural patriot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into a concept of *Kulturnation* oriented by language, thus making the concept of *Kulturnation* a concep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prachnation*, which contrasts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Staatsna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Sprachnationalismus